

名誉主编：钟敬文 张岱年

名人
書系

谈恩师

邓九平 主编



名人
書系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张岱年题



· 下 ·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谈恩师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谈恩师

· 下 ·

邓九平
主编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张岱年题



名誉主编：钟敬文 张岱年



名人
書系

我师夏衍

黄宗江

我师夏公，师其艺，更师其义。

艺者艺文，尤其剧艺，是我一生从事的事业，社会事业。

义释多元亦一元，是正义、道义、主义，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，社会理想。

我生于1921年，成长于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交错的三十年代中国，上下左右而求索，苦读被视作洪水猛兽的书籍。夏著《包身工》，夏译高尔基的《母亲》，以至《赛金花》、《秋瑾》、《上海屋檐下》……均是我少年时重要的启蒙读物。我辈三十年代青少年，身处受压迫被侵略的不平国土，必然也这样或那样地靠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追随之亦不免时而困惑于彼时彼地的路线之争。

那时候，我们早就知道夏衍是文化战线上的一员干将，是左翼、左联先行者之一；后日却常被扣上各色的右的帽子，如“四条汉子”、“夏陈路线”乃至“老头子”、“祖师爷”等等。今日盖棺论定，确是赤诚汉子，遵循的路线多属正确，一向“警惕右，主要是防止左”；对后辈善于引导，戏称个“老头子”或“祖师爷”也是恰如其分的。

我得识夏公本人迟在1943年春，我于1942年岁末离开上海舞台投奔重庆剧坛。在上海同台的地下党员岱云交到我手一笔旅费，说是蔡老板蔡叔厚从重庆汇来的。我已经懂得蔡老板者是为了党的事业仗义疏财之士也。抵重庆我就投奔到刚成立

♣
黄宗江
·
我师夏衍

不久的中国艺术剧社。领导人是从沦陷的香港撤退来渝的于伶、司徒慧敏、宋之的诸前辈，对外则是身份既复杂又单纯的金山，内部有形无形的核心夏公也，直通“红岩。”

我此时在上海已经是和石挥竞争的名演员，到了重庆，人生地不熟，安排试用并管道具。当时自己年轻，也无所谓。不数月，剧社在北碚歇夏，忽然内部乱起，我只见蓝马砸碗，金山发吼，沙蒙出走……后来就关门开会了，我这试用的当然未得入门。现在想来也只是内部的小小的一场路线之争。只见年高德劭的夏公到来了。当时我心目中的夏公已经是位可敬的老人了，其实他才四十来岁，比我们现在还小得多。事后传言，夏公说我不以试用为意，态度颇佳，应正式起用云云。随后就补了沙蒙去延安而出缺的学术部长，演剧上也渐得发挥。我这山城二载可说是自己演剧生涯的重要阶段，见载于夏公的《懒寻旧梦录》及致姜德明书《关于诗》谈到《戏剧春秋》在重庆的演出：“当时名角如林，特别是黄宗江一个人扮了三个角色。”我作为一个艺人当然是感到知遇的，但我更感到相知的尚在诗外、剧外。

偶在剧场后台，我上了装正在等待上戏。夏公常是那样默默地出现。他坐到我化装座旁，给我一封长信看，是张骏祥从成都寄来的。又一次是一封柯灵从上海寄来的。所述均为当地戏剧演出情况。我一再听到夏公轻叹：“多好的朋友，同志！”我感到这些书信来往，不尽是相濡以沫，而是这两位当时的“民主人士”，向党的“汇报”。夏公在周围团结了多少人！

除后台外，我又时见夏公于当时重庆惟一的心心咖啡馆。那里常有文人报人聚集闲聊。我记得的有徐讷、杨彦歧、万枚子……诸君，可说是诸多不同政见者。常见夏公娓娓而谈，极其平易友好，真诚待人。具体谈什么，我早就记不清了，但我那时就感到如夏公者是真正理解并执行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。真诚乃得统一于同一战线，而不是有些人那样把“统战”视作虚与委蛇。

一日，剧社学术部请心理学专家丁瓚来讲演，由我主持。开

讲前夏陪丁来了,并邀我一起在附近小馆吃早点。夏公说起很多人 与事是想不到的,如臭名昭著捧袁世凯称帝的“筹安六君子”中的杨度后来居然成为我党党员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我真感到我党的博大,有着心胸博大的党员如夏衍。(后来我也不免想到丁瓚在“文革”中惨遭迫害致死。)

夏公有时还会说起“某某是小特务,我已经警告他不许捣乱”之类。

夏公在生活中常是一语解纷的人。1944年我离开了以金山为首的剧社,参加了以张骏祥为首的剧社。我告别金山,一言不合,还在剧社正在跑码头的五通桥桥头大吵了一通。回到重庆,我先去见夏公,夏公微笑,淡淡地问起:“和金老虎吵了?”我顶了几句:“他还是前辈呢!……”夏只莞尔一笑,我亦释然。我曾见金老虎、阿丹辈在夏公面前口出不逊一如顽劣儿童,夏亦莞尔耳。夏公在我们后辈中常是并不多说,只一言一笑就解了我们之间儿女的、友情的乃至政治上的积怨。他虽在艺文上、新闻上、政治上均是长者,却从不传教、说教,仅以身教。其形象、行为使我感到夏公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位共产党人。这一人情味常被指责为右而又右。

在此大段抄录夏公《懒寻旧梦录》最后一节,共温之:“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被推倒了,其结果呢,封建宗法势力,却‘我自巍然不动!’1957年以后,人权、人格、人性、人道都成了忌讳的、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,于是,‘无法无天’,戴高帽游街,罚站罚跪,私设公堂,搞逼供信,都成了‘革命行动’。反思是痛苦的,我们这些受过‘五四’洗礼的人,竟随波逐流,逐渐成了‘驯服的工具’,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。当然,能够在暮年‘觉今是而昨非’,开始清醒过来,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。我还是以屈原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:‘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’。”

十年前,夏公在自己的回忆录的最后,写下了这一段,真是

此一世纪老人出自肺腑的结语。我辈当追随求索。

1990年金秋,在夏公故乡杭州召开了夏衍研讨会,时尚无阻。我发一言,称夏公为真正的共产党员。日本友人、夏衍研究并翻译专家阿部幸夫教授激奋地说:“我同意黄宗江同志的话,夏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!”我想我们均无意讥讽谁是假的,谁若自己认领,其必是真正的假的了。《懒寻旧梦录》中还提到“假如说‘金无赤金’,那么,田汉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”。亦夏衍也。

解放后,我投入军中从艺,和夏公便少直接接触,但所有我写的电影剧本均呈夏公过目,必得其详加批阅,我珍藏之有如老师批改的儿时作业。1957年反右时,我的首长对我说:“你也够呛!我们研究过,你过去在白区和夏公在一起,算了!”我事后戏言:“吴祖光沾夏衍光成了右派,我是沾夏衍光成了左派。”这大概是因为夏在军中文艺界尚无积怨,我此戏言还是有些依据的。当然,我仍在劫难逃。“文革”前整夏衍时,我暴露思想说夏衍是悲剧云云,后被上纲为“社会主义有悲剧”,写进定罪结论。“文革”之初,我的第一顶帽子就是“三十年代反动文人”。我不免辩解:“我少时便读过夏著等,可称反动儿童,称反动文人太高了。”他们自是不依不饶,我只得勉称自己“四十年代参加了三十年代反动营垒”。的确是营垒,却是革命的。“四人帮”有一点没说错:是以鲁迅为首的。

“文革”后第一个春节,我和赵丹等同去给夏公拜年。辞别时,夏公拖着一条打断了的腿送我们出门,握我手说:“少壮派!好自为之。”斯时我答:“夏公,我也年近花甲了。”夏公莞尔一笑:“对我,总归是少壮派。”好一个“总归是”,此后我乃常以永恒的“少壮派”自居自励。

每逢九九,夏公诞辰,我常和几个知交去给夏公拜个寿。平日则很少登门,自谓不干扰便是尊敬。我师仙逝前约一个月,我的剧本选在岁月蹉跎中终于出版了,戏剧戏曲卷,恩师曹禺赐题

《舞台集》；翻译改编卷，恩师佐临赐题《嫁接集》。连同另一卷较早出版的电影剧作选，恩师夏衍赐题《单枪并马集》，一并送到医院，夏师床头。这自是一种汇报。妻和我一起去的，并约了常去问候的书史公姜德明引路。随后钱辛波、钱江父子出来了。我妻拍了照，不幸相机失灵，深憾。我已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。后见二钱发一文，提到夏公说，有些人出书跟砖头一样重，成心不让人看。妻说多半就指的是我刚送到枕边的那本厚达667页的。我其实也并未奢望他老人家真地卧榻翻阅，只想到他枕边曾放过我这样一块重重的砖头，足慰平生矣。那天夏公声音已微弱，只对我又是莞尔一笑，说了句：“依还满活跃。”在一旁的注释家姜德明便感到这是对我的极大的鼓励了。我永远铭记恩师遗言赠语，做一个“总归是”的“少壮派”，继续“活跃”至终，师法吾师。

一个小学生的怀念

——白尘师周年祭

范 用

♣
范
用
·
一
个
小
学
生
的
怀
念

白尘老师！您离开我们就要一年了。在这期间，怀着悲痛的心情，我又读了您的文集、剧作集和尚未结集的回忆录，您给我的二三十封书信（您的信，哪怕一封短简，都写得端端正正，一笔不苟），回忆起许多往事，无尽的思念。

跟您在一起的时候，十分开心，您讲话总是那么风趣，跟您的文章一样。您的剧本，尤其是喜剧、讽刺剧，每每引起观众大笑，或者会心的微笑，笑和泪混和在一起。在这方面，您也称得上是语言大师。

在您跟前，我感到十分亲切温暖。1936年十四岁那年，我头一回见到您，您就跟我开玩笑：“唷！小把戏，像个小姑娘。”本来嘛，小孩子在陌生的大人面前，免不了有点腼腆。不过这一来，我的紧张心理消失了。加上您说话带点儿苏北口音，我这个镇江人听起来，格外亲切。

那时候，我还不懂得什么是“作家”，只晓得您是位有学问的先生。听说您坐过牢，我好奇，从未见过“共党嫌疑犯”，想看看是什么样子。

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什么，您倒盘问起我：喜欢玩吗？打不打架？爱看书吗？看些什么书？还问：喜不喜欢看戏（文明戏）？看电影、唱歌？就像老熟人，一点没有大人的架子。

我一五一十照说。我说，读过你的剧本和小说（后来编在《小魏的江山》、《曼陀罗集》和《茶叶棒子》里）。还说，“你是南国

社的,叫陈征鸿。”您大为惊奇,睁大了眼睛。其实我是听一位小学老师说的,他有一本《南国月刊》,我看了。

那时,我对文明戏已经不感兴趣,演员的夸张动作,“言论正生”长篇开讲,有点受不了。南京国立剧专到镇江演出话剧《狄四娘》、《视察专员》(果戈理的《钦差大臣》改编的),使我大开眼界,尤其是舞台装置,前所未见。到台上演演戏的想法,在我的头脑里萌生,您大概看出了这一点。

您还看出我爱看闲书,杂九杂八的书,爱看小说,爱读剧本,送给我一部《复活》,是耿济之翻译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,封面上印有“共学社”几个字。这部小说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,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染了我,十分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玛丝洛娃,为她流了不少眼泪,我憎恨那个虚伪的贵族地主少爷聂黑留道夫。1937年冬天,我逃难都带着老师送我的这部小说,后来一位同事借去,弄丢了,还着实难过了好些日子。

您回到上海,订了一份《作家》月刊给我看,还寄来鲁迅先生主办的刊物《海燕》。有一本《小说家》月刊,也是您寄给我的,上面有小说家座谈记录,提倡新人创作。这一下我来了劲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不问行不行,大胆地写了起来。

我写了一篇题为《教室风波》的短篇小说(准确点说是篇速写)寄给您,不久,在上海的一本刊物上登了出来。如今想不起刊物的名字,是本跟救亡运动有关系的半公开刊物。

那时,政府不准讲抗日,我写小学生拒用东洋货铅笔,闹出一场风波。我把校长写成反面人物,其实我的小学校长并不是那种人,是虚构的。我怕校长看到不高兴,产生误会,没有投寄当地日报副刊。当然还不至于像现在动不动要告你,请你吃官司。

老师!就这样,您不断鼓励我、引导我练习写作,给我打气,可我不是这块料,又不肯下功夫,辜负了您的期望。

演戏我倒蛮有兴趣,大概是觉得好玩吧。我和同学们组织

了一个“镇江儿童剧社”也得到您的鼓励与支持。我们演了三个话剧：《父归》、《洋白糖》（洪深、凌鹤等集体创作），以及您用墨沙笔名发表在《文学》月刊上的《父子兄弟》，演出地点在伯先公园讲演厅。

前年，读您的回忆文章《漂泊年年》，知道早在1929年，您和左明、赵铭彝在镇江组织“民众剧社”，也演过《父归》，而且也是在伯先公园演讲厅。更早，在上海，南国社演出《父归》，您演二哥，即菊池宽原作中的新二郎，而我在儿童剧社，演的也是新二郎，都是巧事。

1983年，随阳翰老到四川访问，旅中我与您谈起《父子兄弟》，您告诉我，这个剧本实际上是田汉写的，当时他被捕，刊物不能用田汉的名字发表，才由：墨沙”顶替。怪不得，您的剧作集里没有《父子兄弟》，查《田汉文集》，也不见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。

田汉先生在“文革”中被残酷迫害致死，至今已经二十几年，尸骨无存，骨灰匣里并没有骨灰。他和您都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，以笔为武器，以舞台为阵地冲锋陷阵，并肩作战，您同“田老大”的“黑帮”关系，够您交代的。人民不会忘记你们，历史是最公正的，我相信。

您写信告诉儿童剧社：不要光演大人的戏，小孩子应当演儿童剧。您寄来了许幸之的两个儿童剧：《古庙钟声》和《最后一课》，还特地写了《一个孩子的梦》独幕剧。印成书，前面有一篇长长的《代序——给我的读者》，开头是这样的：

“亲爱的读者：你今年十几岁？几年级？——我们谈谈好吗？——嗨！别绷着脸，我们做个朋友吧，告诉你：别当我跟你们老师一样，是个又高又大的大人；来，比比看，我跟你一样高哩！今年，我小学还没毕业呐！来，这儿是我的手，我们握着。

“好了，谈吧——你想读这本《一个孩子的梦》么？慢着，先让我们谈谈。”

于是,您就谈心、讲故事那样,跟小朋友谈了许许多多,真有味。末了,您要小朋友:

“请你写封信来,我们永远做个朋友。另外,我还预备一件礼物送给你——我的通信处是:

上海,静安寺路,斜桥弄,读书生活出版社转陈白尘收。”

我们收到这三个剧本,高兴得跳起来,马上排练,准备暑假演出。没等到这一天,卢沟桥炮声响了,神圣的抗战开始了,儿童剧社改为街头宣传演活报剧,演了《扫射》,好像也是您赶写出来的,是讲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屠杀中国老百姓的。

在《一个孩子的梦》这个戏里,小学生高喊出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(书上只能印成“打倒××帝国主义!”)排练的时候,我们一遍又一遍高呼口号,说不出的痛快,到现在我还想得起来同学们激动的样子。现在年轻人、小朋友难以想像,在“救国有罪”的年代,在公开场合喊这个口号多不容易。你要抗日?哼!你是思想“左倾”,是“受共党煽动,危害民国”,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李公朴等“七君子”不就因为这个吃官司,关进监牢。

当年,为什么小娃娃演戏,有人愿意掏钱买票看?现在回想起来,可能出于爱国心。儿童剧社公演的收入,全部捐给了傅作义二十九军,支援绥远抗战。在民族存亡之际,同仇敌忾,老百姓不甘心做亡国奴,拥护救亡运动,何况又是小孩子们的爱国行为。除此,老师之所以给予我们鼓励,可能还有一个原因,希望小演员将来成为大演员,参加到演剧行列中来。

有意思的是,下一年,1938年,我在汉口找到的饭碗,就是出版《一个孩子的梦》的出版社——读书生活出版社,也就是后来的三联书店,您说巧不巧?这碗饭我一直吃到退休。吃这碗饭有顺心的时候,也有倒霉的时候,有开心的时候,也有苦恼的时候;还有“莫名其妙”(我们小孩子的用语,您懂得)始终弄不明白“什么是什么”。“曾经深爱过,曾经无奈过。”“谁能告诉我?”老师!真想跟您谈谈这几十年!

您有了第一个孩子,从上海寄给我一张他满月的照片,说是我的弟弟,是的,是我的弟弟,尽管后来始终未见过一面。不幸的是,五十年代他在留苏学习期间早逝,如果还在,现在也有六十岁了。他的照片我保存至今。

“八·一三”以后,您组织影人剧团到重庆、成都演出。您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,演出轰动了大后方。到抗战胜利前后,您的剧本,包括电影剧本,达到您创作的顶峰,给中国话剧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。在复杂的社会、政治环境中,您主持剧社,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。我既读剧本,又看演出,得到极大的满足。

我告诉同事:陈白尘先生是我的老师,甚为得意,而您也认可了。后来,1983年,在成都的一个座谈会上,您当众用四川话说了一句:“范用是我的学生。”阳翰笙、葛一虹、戈宝权、罗荪、凤子先生在座,他们一定奇怪:白尘怎么会有一个干出版工作的学生?我只得也用四川话说:“学文不成,学戏又不成,我这个学生愧对老师。只能说在做人方面没有丢老师的脸。”今天我要再说一篇,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。

抗战八年,胜利前后,您在党的领导下,办剧社,编报纸,还有文艺界协会工作,团结了许多作家和剧人影人。在反对独裁,争取民主的斗争中,您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,可他们又不敢拿您怎样,他们造谣,说您是“中共江苏省委书记”,要组织暴动。江青这个混帐东西和她的走卒,把您说成“黑线”上的,诬蔑您是叛徒,进行疯狂的迫害,还搞了个“中央专案组”审查,要置您于死地,还不是因为您知道她的老底子的缘故。国民党反动派没能做的,披着共产党外衣的“四人帮”做到了。

1947年在上海因《文萃》一案,我被“中统特务”抓去,关押在亚尔培路二号,与陈子涛同志同一囚室。子涛跟您,还有黎澍先生在成都办《华西晚报》,特务捣毁报社,子涛奋不顾身抵抗,保护排字房,遭到特务毒打。他逃到重庆,我们相识,两年后成

了难友。子涛这次被捕,屡次受刑,英勇不屈,终遭杀害,与骆何民、吴承德同为“文萃三烈士”。如今雨花台有他们的墓,只是空的,据说子涛是装在麻袋里投入大江的。

子涛嘱咐我于获释后向您汇报《文萃》被敌人破坏的经过,我到狄思威路您家中详细谈了。又按照子涛说的,买了两条香烟托看守送进去,他就知道已经见到您。此时已是黎明之前,漫漫黑夜快到尽头,白色恐怖达于极点,风声日紧,您工作很紧张,处境危险,我十分担心您的安全。

解放以后,您到北京工作,彼此都忙,难得见上几面。每次见到您,您还是用鼓励的、企盼的眼光看我,仿佛我还是当年的“小把戏”。虽然已经风风雨雨,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可都还想多做一点工作。我在出版方面有了为老师效劳的机会,如您所说:“《宋景诗历史调查记》是你我合作的第一本书。”

我期待您写的电影《鲁迅传》与观众见面,几年下来,没有下文,内中原因不得而知,担心被“枪毙”了。去年读陈虹的《父亲的故事》一文,才明白那时您已处于窘境,写作“如履薄冰”,“不寒而栗,战战兢兢地过日子,以“但求工作上无过,不求创作上有功”为座右铭。可悲也夫!

“文革”期间,我们都失掉了自由、成了“黑人”,进了“牛棚”(北京叫“黑洞”)。前不久,金铃师母来京,给我读了您冒着危险、偷偷写下的《牛棚日记》,才知道您所受的非人待遇,我欲哭无泪!在这种情况下,您还是那么泰然,那么冷静。您在日记中一再写道: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……”,真是“死不悔改”。可是光有信念不行,人毕竟是血肉之躯,实在受不了的时候,难免会有一了百了的念头。幸好,您挺过来了。我那时也是这么想的:决不能轻易地做殉葬品,无论如何要活下去,一定要亲眼看到黑暗势力的灭亡!

愿世人都一读您的《牛棚日记》。否定不等于忘却。巴金先生倡议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不能实现,那么先建立在人们的心上

吧。《牛棚日记》将成为“文革”丑恶历史的见证，长留人间。

在那黑暗的日子里，我有幸见到老师一面。有一天，“造反派”恩准我取东西，我溜到东总布胡同口小酒店打酒，正排着队，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捅我的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师您也来打酒。您示意不要交谈，一不小心，会有人揭发（我就被同院的人告密过），被安上“反革命串联”的罪名，真是恐怖世界！我看到老师身子还好，心头为之一宽。这一天，闷头酒我多喝了一盅，默祷老师平安！

范用·一个小学生的怀念

1969年9月，我们被驱赶到咸宁“五七干校”，成了“同学”，别人是“五七战士”，我们是“监督劳动”。在“战天斗地”的日子里，能够活下来就算大幸，还有什么盼头，前途茫茫，谁也不知道命运如何。我在汀泗镇烧石灰，您在“向阳湖”当“鸭司令”，仍然见不上面，仍然不敢来往。后来您写了一本《去梦断忆》，详细记下了这一段苦难的日子。有家归不得，“向阳湖”成了“望乡湖”！

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，才又重见老师。《读书》杂志编辑部请南京、上海部分代表跟李一氓、夏衍先生在一起吃了顿饭，那次会开得很成功，因而这顿饭吃得很愉快，我又见到老师谈笑风生，人们真的以为文艺的春天来临。第二天，氓老派人送来一个条幅：“文酒足风流，杯倾松鹤楼，何时摇画舫，一夜到苏州。（甲子冬夜沪宁旧友聚饮松鹤楼系以小诗，范用兄实主其事录博一笑）”，可见老人心情之舒畅。转眼十几年，氓老，夏公，您先后都走了，不胜怆然！

后来，收到您寄来话剧《大风歌》稿本，我为老师重又执笔而欣喜。三联书店出版作家回忆录，希望文学前辈都给后人留下一本，白尘先生当然也在其列。你接受了我的请求，八四年九月二十日来信告诉我：

“我有个秘密计划，如果《童年》可读，则拟续写《少年行》，写初中到一九二八年离开学校止，再后写青年、中年以及老年时代，亦即三年流浪、三年狱中生活、上海亭子间，抗战前后、解放

后十七年等生活,以后接上《断忆》、《听梯楼》,共七八册,形成系列的生活回忆(但我避免叫《回忆录》这一名称)性的散文,算作对人世的告别。(话剧我是没精力写了!)但这秘密从未告诉别人,因为是否写得成,是否能出版(如写十七年等),均不可知也,现在从远处写起,是避难就易之策。”

看得出老师写作情绪很好。这样,陆续印出了《云梦断忆》、《寂寞的童年》、《少年行》这几本,等到《漂泊年年》写成,我退休了,此事告搁浅。但我认为这一项工作必须完成,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写出来,出版总归有办法,并非所有的人都盯着钱,都是浅识之辈,为此,我一再写信催促,车辐兄去南京,还拜托他向老师进言,是否找一个助手,如爱徒李天济?九一年二月,收到老师的来信:

“我那本回忆录你还耿耿于怀,大可不必的。我自己从两年前生病,即已心灰意冷,搁下笔来了。自问非名人,没有人等着看它,何必自作多情?再说卧病以来,头脑终日昏沉,除少数朋友通信外,几不能执笔矣!写信也只能每日一封,多则头脑发昏不已。盖两年来耳聋眼花,腿硬如木,垂垂老矣!

“令外孙女的作文,其妙无比。她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。‘你说他怪不怪?’我说你也真怪,退休了,该享清福了,偏要找事做,何苦呢?新的出版社也未见得能扭转乾坤的。

“但我内心里还是感激你的,而我只能恳请你原谅了。”

读信,我的鼻子酸了,几乎落泪。“垂垂老矣!”“几不能执笔矣!”病中作书笔迹然那么清逸,那么工整。

老师!不是我找事做,只是想做完该做的、未了的工作,求得心安。老师以为我闲下来“处境不佳”,反而劝慰我。

这部回忆录终于未能写完,成为憾事。可以告慰老师的是,陈虹已在整理父亲的遗著,包括这部“告别人世”的回忆录。我向她建议,把已经写成的,已发表和未发表的,以及《牛棚日记》、《听梯楼随笔》集为一卷,如夏公《懒寻旧梦录》那样一本,交付

出版。

“等闲白了少年头”，如今，我也老了！可是在您的面前，我永远是小学生，一个不及格的学生。您的深情厚爱，学生永久铭记在心！

魂兮归来，白尘老师！

抗战胜利五十周年，乙亥清明。